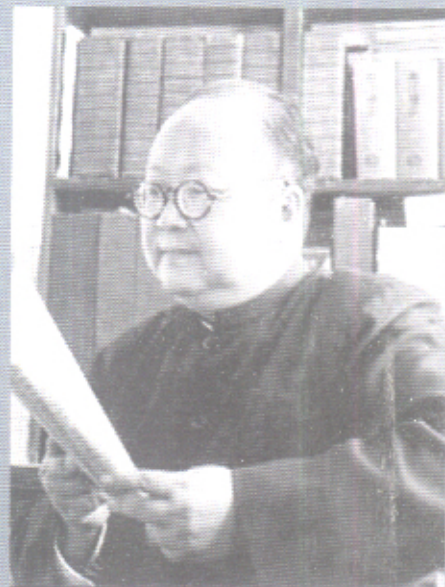


潘光旦论通识教育

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人格。我以前在别处讨论到过人格有三方面,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通性,二是此人所以异于彼人的个性,三是男女的性别。健全的教育是三方面都得充分顾到的,如果舍男女之别不论,则须兼筹并顾的至少尚有两方面。个人的先天性格尽管不免有所偏倚,教育的鹄的则不能不力求通性与个性的平衡发展。通性是通才教育的对象,而个性是专才教育的对象;一个人应当受的教育是一个通专并重的教育,以至于“通”稍稍至于“专”的教育,因为归根结蒂,我们必须承认,做人之道重于做事之道,生命的范围大于事业的范围。至于一个人究能通到什么程度与专到什么程度,那自须看他的才力了。这一层理论我相信是古今中外所同的,从前“本末”“博约”“文质”一类的原则所指也未能外此,杨雄的儒伎之分所指的也就是通才与专才之分。



我一向感觉到近年来大学理工教育是不健全的。其所以不健全之故并不在专的过度,而在通的程度远不足以相副。有充分通识做衬托的专识,无论专到何种程度,是不妨的。至于通识不足,或极端缺乏,即使专的程度不深,也往往可以误人误事。所谓误人指的是人格的畸形化,成一个偏废或半身不遂的局面。好像西洋有一位生物学家说过,“专化的代价是死亡”,在生物学界里此种例子最多,而其中最足以发人深省的是龙类。近代欧西文化的危机,我以为也就在此,欧洲的理工文化,已经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程度,其结果是战争、屠杀与死亡。族类专化的代价如此,个体大概不成例外。

第二方面指的是对于事业的妨碍。一个专家,如果没有充分的通识做衬托,其实是等于一个匠人,至多不过比普通的匠人细腻一些罢了。第一,他不大了解他所专擅的学术以外,尚其他的学术,他不大知道他的专门学术在整个学术界里,以至于全部的文化生活里,究占多大一个位置,究有多少分量,究应如何配合起来,方才觉得称当。第二,他不大认识人。他和从前的读书人似乎恰好相反,懂得“物”是什么,声光电化是什么。但人是什么,他多少有几分莫名其妙。因此,不但他的学术事业和别人的不容易配合起来,他和别种学问事业的人,以至于和同学问、同一事业中的别人,也容易发生扞格,发生滞纳。……

不过第三个理由终究是最关重要。只有专才,而没有通识的人,是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与文化所瞧不起的人,而此种瞧不起的态度是很有理由的。上文提起过,此种挂一漏万的专才或只钻牛角尖而不识大道的专才是畸形的,是残缺的,也就是不健全的。……

“工与中国文化”(作于1943年),选自《潘光旦选集》459-463页,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。